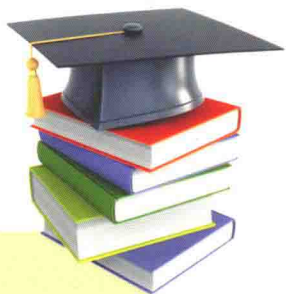


踏上**名校**的台阶

上海家长的择校补习决策行为分析

张舫瑶 著



上海三联书店

踏上名校的台阶

上海家长的择校补习决策行为分析

张舫瑶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踏上名校的台阶:上海家长的择校补习决策行为分析/张舳瑶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6. 1

ISBN 978 - 7 - 5426 - 5450 - 2

I. ①踏… II. ①张… III. ①家长—补习学校—选择—决策行为—研究—上海市 IV. ①G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6510 号

踏上名校的台阶 ——上海家长的择校补习决策行为分析

著 者 / 张舳瑶

责任编辑 / 杜 鹏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2895559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10.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5450 - 2/G · 1414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家长微观决策行为：你真懂了吗？

张舫瑶在修习博士课程的过程中，在广泛的公共政策话题中，她对教育问题情有独钟，特别是对择校和补习等每个家庭都必须面对的艰难选择抱有极高的兴趣和探索的强烈愿望，这是从事教育研究最基本的动力，但是，怎样将这种热情和兴趣转化为学术研究问题，并且使用合适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它，则是一个博士生必须完成的跨越。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但又是幸福的，在这个过程中，她超越了对教育问题的情绪性反应，开始学习系统的逻辑分析。作为张舫瑶同学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之一，当我知道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即将出版其研究成果时，我欣然应邀作序，我认为这个过程不仅对于她本人，而且对所有关心教育的人，都有启示意义。

张舫瑶的研究否定了家长选择的一致性，她利用“齐当别”模型说明家长做出择校和补习选择时的基本模型，认为家长做出择校和补习等决策行为的机制不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某种形式的期望值，而是某种形式上辨察、选择对象之间是否存在“优势性”关系。常用“与其……还不如……反正……希望……”的表达式来进行判断表达：取/舍，抓/放，补习/不补习。其中，班级地位是自变量，参与补习是应变量。而班级地位是限定条件。

结论是：对于班级地位高的学生，家长参与补习的动机不明显，班级地位中等的学生，他们的家长参与补习的动机最强。

当然，在家长一般决策模型基础上，张舫瑶同学在研究中还提出了同侪影响和学校行为对于家长决策行为的修正。通过案例研究，她介绍了优质学校和社会环境对于家庭个体行为的不同影响机制。

也许，家长们对于以上这些模型和推导不感兴趣，但是，我想说明的是，这种分析过程和结论是非常重要的，它说明补习和择校问题不是政府出台一个“禁止”择校和补习的政策就能够起作用的，但学校提供的学生在班级中的地位信息的类型和性质，却对家长做出补习和择校的决策发挥重要作用。优质学校如果没有差异化的质量观，反而陷入与一般学校进行同质竞争不能自拔，则优质学校会加剧学生家长的择校和补习决策行为，以适应优质学校的教学方式并进一步在人群中产生暗示效应。

张舫瑶的研究揭示了我国公共教育政策中一个被长期忽略的现实，即微观个体往往被政府文件假定为“同质的、可操控”的个人。面对家长的补习和择校行为，“禁止”型的规定往往立足于“堵”住“失序”行为，而缺乏从机制中寻找逐步改善路径的“习惯”，政府与公众、与学校等机构间的关系是“管理”和“服从”的关系，而不是“互动”的过程。

当前，我国公共教育的“秩序”正在朝着公平的方向不断推进，家长为了自己的子女进行的各种“自利性”的教育决策被认为是违背公共教育精神的。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会逐渐浮现出来，即教育政策在落实公共性的时候，怎么看待家长的择校和补习决策行为？坚决制止还是留下点空间？坚决制止所导致的局面会是怎样？而留下空间又是以什么形式留下？教育

是国家(政府)、社会(社群)和个人(家长)间复杂的、长期互动的结果,如果一直维系政府对于个人(家长)的单向作用,则这种教育格局是否是我们真正追求的目标?

看上去你是在做出这个暑假要不要让孩子补课的决定,实际上,在你决策的背后,是你根据自己孩子的班级地位进行优先排序的过程,是你受政府和同侪影响,并不断感受不确定条件下决策痛苦的过程。张舫瑶通过对不同类型上海家长补习和择校选择的一个个案例,向你生动地展现了社会互动的“镜像”。

北京师范大学 曾晓东
2015年10月

目 录

1. 绪论 / 1

1.1 问题提出的背景:由择校到补习 / 1

1.2 研究目标 / 4

1.2.1 公共教育制度变迁中的家长选择 / 5

1.2.2 补习决策机制 / 6

1.2.3 家长之间的教育信息传播对补习决策的影响 / 7

1.3 研究意义 / 8

1.3.1 社会管理意义 / 8

1.3.2 家庭财富管理意义 / 9

1.3.3 个人职业生涯管理意义 / 9

1.3.4 理论意义 / 10

1.4 本章小结 / 13

2. 家长决策的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14

2.1 义务教育课后补习家长决策行为研究的核心概念界定 / 14

2.2 国内外课后补习家长决策基本理论与研究文献回顾 / 23

2.2.1 决策行为的基本理论 / 23

2.2.2 国外补习研究的进展及启示 / 26

2.2.3 国内义务教育课后补习教育研究的现状与反思 / 30

2.2.4 评述 / 35

2.3 研究设计:案例与模型 / 38

2.3.1 案例来源于实地调查 / 39

2.3.2 实地调查的初步结果 / 40

2.3.3 提炼实地调查后得到三个案例:MQT / 43

2.4 本章小结 / 44

3. 义务教育课后补习家长决策行为的基本模型 / 46

3.1 义务教育课后补习家长决策行为的动机一致模型 / 47

3.1.1 家长课后补习的动机一致模型分析 / 47

3.1.2 假设一:家长课后补习决策动机受孩子的班级
地位影响 / 50

3.1.3 不确定条件下班级地位的判断——齐当别判断式 / 51

3.2 义务教育课后补习家长决策行为的成本模型 / 52

3.2.1 课后补习家长决策的成本比较模型分析 / 52

3.2.2 假设二:家长补习决策行为受公立学校的教学组织方式影
响 / 56

3.2.3 课后补习家长决策的成本比较模型的判断表达式——齐当
别 / 58

3.3 案例 MQT 对模型的验证 / 58

3.3.1 案例 M 对家长课后补习决策行为模型的验证 / 58

3.3.2 对案例 Q 的描述 / 61

3.3.3 对案例 T 中家长决策行为的描述 / 63

3.4 本章小结 / 65

4. 对家长课后补习决策行为模型的同侪影响变量修正 / 67

4.1 “第二自我”原理与上海教育妈妈补习决策行为的同侪影响 / 67

4.2 信息不对称与上海教育妈妈课后补习决策行为的同侪影响 / 75

4.2.1 信息不对称与课后补习决策对社会阶层的确认 / 75

4.2.2 信息不对称与课后补习教育机构的供给诱导需求 / 78

4.3 人力资源市场的一致偏好与教育妈妈决策行为 / 81

4.4 本章小结 / 83

5. 关于补习治理的制度性评论 / 84

5.1 家长教育选择权 / 84

5.2 政府对课后补习教育的社会治理 / 87

5.3 家长教育启蒙 / 88

5.4 本章小结 / 90

参考文献 / 93

英文参考文献 / 98

附录 1:《上海义务教育择校家长补习决策行为研究》的田野调查 / 101

附录 2:上海 2013 年小升初时间表 / 110

附录 3:访谈提纲 / 115

1. 绪论

1.1 问题提出的背景:由择校到补习

贝克尔(1981)在《家庭论》的第一版中,探讨了家庭投资孩子的教育成本问题。贝克尔(1991)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不同成员的商品、时间、货币和技能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会产生出联合的效用,这些效用包括孩子、商品、技艺、健康、声望等家庭产出。家庭行为受货币和时间两个因素的限制、决策的代价要用时间和货币来衡量。”^①贝克尔对经济分析的最大贡献之一是他在“家庭范畴全面应用了传统上只用于研究企业及消费者的分析框架”。早在30年前,贝克尔已经解释了国家政策下及不同条件下分析家庭行为的方法,也分析了国家干预家庭决策的好处。他引用了汤普森和卢特尔(1967)政府干预家庭决策的原因。

1978年以来,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几乎每个城市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的对子女的严重利他主义倾向的表现是关注孩子的考试结果重于成长过程。1986年,中国颁布了《义务

① [美]加里·斯坦利·贝克尔,家庭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

教育法》，这使得数以亿计的家长们对国家实行义务教育政策过程中的教育机会公平问题产生了不同理解。尤其是义务教育中“就近入学”政策实施以来，家长择校便如影随形，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为了回答择校现象是怎么回事、人们如何看待它，研究者对择校现象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并就教育机会公平分布的义务教育理念，对择校现象，特别是以权择校、以钱择校进行了批判。现有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另外一群择校家庭，他们没有权，也没有足够多的钱，但是，他们对子女的教育也有非常高的期望，也因此有极高的焦虑，这些家长选择“以成绩择校”，让孩子通过各种各样的筛选考试，拿到优质学校的“入场券”。为了实现以成绩择校的目的，这些数量众多的家长有着怎样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又对我们不断改进义务教育体制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对此，教育理论和公共政策领域又进行了哪些研究？

“以成绩择校”在社会文化层次上符合社会规范，因此，在公众中享有很高的可接受性，但是，它却与义务教育的制度规范产生了冲突。于是，“以成绩择校”始终处于事实上的合理与法理上的不合理之间，政府影响学校的筛选标准，而学校的筛选标准又影响家长的子女教育策略，这其中生动地反映了制度、规范与人的现实行为间的相互作用过程。在家长的子女教育策略中，比较集中反映其教育行为的，是课后补习教育，它是功利性的，有明确的目的，不包括家庭进行的素养教育。本书希望通过对家庭择校为目的的课后补习教育的观察，认识家长的课后补习决策行为特征，认识补习作为正规教育的“影子”的性质。

课后补习行为首先是一个逃离公共教育所配置的教育机会的行为。在公共教育领域，政府已经为每一户籍家庭提供了一个免费的义务教育学位，然而，家长作为家庭教育投资者

却宁愿放弃就近入学的公立初中,而要选择付出高昂交通成本的学区外公立初中学校,包括私立初中。在“就近入学”政策框架之下,家长“选择”自己喜欢的学校,就意味着放弃划定的初中学校。

在公立学校体系中,择校是不能按照所支付的价格来选择的,当市场失灵时,“以成绩择校”的家长使用学生的成绩替代价格/择校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生成绩不需要成本,家长追加“课后补习教育”来保持面向中考的竞争力,就是其中的家庭教育经济成本。研究表明(Mark:Bray2009,程全功 2011,弓立新等),课后补习教育代价是高昂的,甚至堪比一般家庭在楼市的月供价格。“不是所有的家庭有充足的财力来支付这笔费用,通常富人或城市家庭更容易获得补习教育。”^①如果说,中国一线城市的天价学区房是一次性的教育投资,而课后补习就是在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的公立学校系统之外连续 12 年持续的家庭教育投资行为,因为接受择校补习教育的学生未来可以通过中考或高考等考试的筛选机制,获得较多的发展机会和经济回报。现实中,课后补习的市场火爆异常,可以说补习教育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朝阳的产业。

家长对课后补习的热衷使得补习市场风生水起。在上海,课后补习机构多达两千多家。不但有中国本土品牌,还有境外补习机构设在上海的分支机构;补习机构的规模不一,有美国纽交所上市的大公司,也有开设在教师家里的小型补习班;不仅针对国内中考、高考的课后补习,也有针对国外高考,比如“SAT”等的辅导。作为中国经济改革,教育服务开放的

① 陈全功、程蹊、李忠斌,我国城乡补习教育发展及其经济成本的调查研究,教育经济,2011 年第 2 期

桥头堡,上海家长能够最先听闻国际教育竞争的新动向以及经济全球化框架下就业趋势的新苗头,上海家长让孩子在选拔考试中脱颖而出的急切心情导致课后补习产品供不应求。然而家长的补习消费决策行为机制是怎样形成的,其决策过程中所依据的决策模型是怎样的,至今无人揭晓,这也是本研究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为了选择合适的学校,大多数家长既不能“以权择校”也不能“以钱择校”,他们不得不走上一条通过课后补习,让孩子获得“以成绩择校”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以获得优质学校“入门券”为目标,家长在选择课后补习、支付货币成本和时间成本的同时,还需要面对政府、学校和家长间相互作用带来的不确定性所引发的情绪焦虑,更重要的是以牺牲孩子的健康和亲子之情以及孩子创造力的磨灭为代价,来博取选拔考试的高分从而取得重点大学的“入场券”。家长这种决策的动机之外,是否存在其他决策动机?本书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问题,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探寻家长在信息不完整的条件下的决策机制,厘清家长课后补习教育决策行为模型,最后,对家长的选择性焦虑进行分析,论述制度环境变化对于改善家长群体的选择性焦虑的作用。

1.2 研究目标

本书通过访谈家长,对家长的选择过程进行案例剖析,说明公共教育作为一项“善”的制度,与多样化的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分析家长的选择过程,发现家长的选择行为与公共教育制度、学校管理制度间的密切相关关系,说明家长的补习决策行为实际上为政府公共教育制度所决定。但是,政府的政

策又不能随意而定,政策的定位和强度仍然要取决于民意的基础,以及公众概念所达到的“水位”。具体来说,本研究将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1.2.1 公共教育制度变迁中的家长选择

20世纪70年代末,传统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发生了变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公共教育成为改革的重要领域。英国是这场改革的领跑者,在整体的改革框架下,公共教育制度发生了变迁,组织结构和治理关系也随之改变,学校自我管理的机构和运行机制得到确立,市场力量介入到教育管理领域。^①在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了各种形式的公共教育改革,以治疗公立学校学生学业成绩低下的“顽疾”,其中,给家长选择学校的权力被运作为对抗公立学校“官僚主义”的策略之一,不仅在理论上形成了公共教育的“选择学派”,还在佛罗里达和克利夫兰得以实施。这些理论探讨和政策实践活动都说明,公平不是公共教育体系唯一的目标,公共教育制度变迁中存在着国家教育选择权与家长选择权的冲突。

在我国,教育事业采取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的领导体制,尤其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机会平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一些大城市还没有为外来务工儿童的受教育机会“打开大门”,学区制还有待完善,义务教育政策的优先点还在于更好地落实教育平等,家长的教育选择权尚未得到政策关注。国家实施义务教育是为了实现对全体国民的教育机会平等,达到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教育部门为了能够实现教育资源均衡,对全国

^① 田凌辉,英国公共教育的制度变迁与组织重构,复旦教育论坛,2005年3月

所有学龄儿童实行就近入学政策。当前关于家长教育选择权的争论主要围绕“择校”进行。家长们认为,政府公共教育制度仅提供保障性的、兜底的义务教育阶段学位,而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加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从而导致家长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出现。或者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就业压力的增加,使得家长们对公共教育体系的效率产生了“信任危机”。^① 因为家长对公立学校的教学方式、教学效率和班级规模的不满意,表现在对公立学校在教育政策安排下的高中入学考试中的成就不满意。而就读于公立学校的孩子应该与就读于私立学校的孩子一同接受政府安排给他们的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拔考试——中考。这实际上存在着“善”的公共教育体制提供的教育起点公平,但是无法提供教育过程的公平,以及毕业生被政府筛选成功进入目标高中的公共教育结果的公平。本书研究家长的选择过程,发现家长的选择行为与公共教育制度、学校管理制度间的密切相关性;另一方面,通过研究家长对课后补习消费行为的决策机制的构成,探索家庭教育选择权在与公共教育政策的互动中,是否对我国公共教育制度变迁产生政策意义。

1.2.2 补习决策机制

补习决策机制是指家长在做出是否参与课后补习、选择哪类补习的决策过程中,其选择动机、选择过程的各种类型的成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具体来说,就是家长是否让孩子参加补习、在K-12的什么学段开始补习、选择什么学科、补习是否与孩子的学科成绩呈正相关、补习的信息来源、同侪影响是否加速了补习

^① 曾晓东,对补习教育体系的争论及其政策意义,万方数据:http://d.wanfangdata.com.cn/Conference_7659099.aspx

的传播以及是否促成中国的优秀青年更远地逃离现有体制。尝试从家长补习决策的动机模型回答公立学校中孩子的班级地位、教学方式是否促使家长参加补习;尝试采用成本模型回答补习是否与孩子学科成绩呈正相关以及是否与家庭的未来收益与代价相关;其次,对于补习班的信息来源,研究者认为家长们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补习机构的供给诱致促使家长进入补习的“囚徒困境”,而这种供给诱致所出示的信息价值也是具有制度意义的。

1.2.3 家长之间的教育信息传播对补习决策的影响

在经济学中,不完全信息条件第一是指,由于时间限制和数据缺乏等因素,决策者们只能了解决策问题的部分信息;第二是指,决策属性反映的是社会和环境的影响性,这一类属性的确难以量化或者确定;第三是指,在复杂和不确定环境下,决策者自身能力有限,不能有效地集中注意力,对信息作出合理的处理;第四是指,各个决策者对于相同的问题,由于其自身经验、知识和偏好的不同,在家庭决策问题中可能出现意见难以统一、决策参数难以确定的现象。本研究中的决策者是家长个体,在中国,由于负责家庭教育的多是母亲,妈妈们对于孩子问题的处理往往感性丰富,而理性不足。

上述不完全信息下的决策同样适用于家长课后补习决策的行为分析。在本研究中,不完全信息是指孩子的班级地位的变化、补习效用与代价、公立学校的教育教学方式、家庭投资的成本与收益等几类参数未能完全确定,在就近入学政策安排下所接受的教育与子女未来就业竞争压力加大的矛盾状态下,家长们不得不做出补习的决策。如前所述,家庭决策行为受货币和时间两个因素的限制。在这里,时间是指孩子的未来,“行为的

最终目标都是将来,一般来说它都是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它的目标一般都是使未来的状态比不采取行动更让人满意”^①。因此,家长不得不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做出补习决策行为。有些家长预期,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那么让孩子在就近入学政策指定的公立学校里顺其自然发展所得到的未来的情形是不会让整个家庭满意的,而所谓优质公立学校的教学方式究竟对小升初择校有多大作用,这个参数也是家长不能确定的。在信息不完全和条件不确定的情况下,为孩子教育问题日夜操心的母亲们就形成一个社会群体,这些教育妈妈,对于公共教育体系和课后补习的认知都存在某种程度的局限性,她们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以及对长时间教育环境(9年义务教育)问题不确定的情况之下,更加相信同届学生的成功家长的教育经验,她们彼此模仿,造成她们的补习决策行为就如发生在集体无意识之中那样自然而然。但是,补习的效果却是教育妈妈们无法预设的。

1.3 研究意义

1.3.1 社会管理意义

义务教育阶段课后补习家长决策行为研究从公民选择权的角度,探讨了家长的教育选择权与国家教育选择权之间的互动,对于教育妈妈摆脱考试教育的集体无意识,摆脱由于升学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家长情绪焦虑,使非理性教育妈妈群体增加教育理性,然而尊重和接受教育的多样化还存在一定的制度空间。有必要对家长群体进行教育民主启蒙。本研究的制度意义是关

^①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上卷)》,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年